

WINTER IN CHINA

溫德先生

親歷中國六十年的傳奇教授

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著

馬小悟 余婉卉◎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中文版序	007
引 言	009
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納人	022
第二章 抵達	045
第三章 清華	067
第四章 瑞恰慈與中國正字學會（1923—1937）	088
第五章 抗日戰爭與中國正字學會	109
第六章 保衛清華	120
第七章 去往昆明之路	138
第八章 聯大之困	149
第九章 正字學會的終結	174
第十章 重回美利堅	194
第十一章 昆明的勝利	213
第十二章 奮鬥	233
第十三章 回家	244
第十四章 誰丟失了中國	263
第十五章 冷戰到來	277
第十六章 聞一多的骨灰	297
第十七章 中國解放	314
第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	331
第十九章 再見，溫德	339
譯後記	349
溫德年表	351

中文版序

1984—1985年，在北京大學講授英語文學和寫作的一年裡，我時常騎車去燕園一角那局促的溫宅拜訪溫德先生，聽他口述人生。當時溫德先生已經九十七歲，他幾年前曾被一輛自行車撞過，後來就幾乎癱瘓在床。不能站立走路是一種痛苦，但與此同時，老年癡呆也如影隨形，他只偶爾有片刻的清醒。連讀書讀報都不能，溫德先生已徘徊在生死邊緣。他問我，能不能做點甚麼減輕他的痛苦，我竟無言以對。也許死亡才是他能期待的唯一慰藉。但是，一個念頭劃過我腦海，也許我可以為他做這件事：把他的人生講給世人聽。我還有一個略微自私的目的：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所知甚少，聽溫德先生講他的人生也可以幫助我了解這個國家。

在中國，溫德是一個謎一般的人物。他的好友包括陳岱孫（經濟學家）和吳宓。他與吳宓一起設計的課目為中國各重點大學英文系所效法。溫德還與蜚聲國際的英國學者瑞恰慈通力合作，在中國推廣基本英語教學項目，但該項目蒸蒸日上之際，卻因日寇入侵而流產。溫德交友很廣，其中還包括傑出的漢學家費正清。二人曾一起向美國國務院陳情，要求停止對國民黨的支持，雖然失敗了。

如果溫德先生僅僅是一位書齋裡的書生，我也許不會對他那樣好奇。溫德身兼如此之多的角色：冒險家、畫家、阿黛爾·戴維斯（Adelle Davis）營養學的追隨者以及精力旺盛的活動家。他曾為了保護學生和同事而與國民黨官員作對，面對將刺刀刺傷他小腹的日本兵，他以怒目嚇退之。他曾英勇支持抗日事業，也曾努力保護聞一多，可惜後者還是未能逃脫國民黨的暗殺（溫德與聞一多最初相識於芝加哥，溫德

之所以來到中國，與聞一多關係很大）。

1930年代的北平，用蒲樂道的話說，“是一座歷經五個朝代浮沉的燦爛城市”，溫德在此有滋有味地生活著，涵育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情趣與追求。但隨著歷史大幕一道道拉開，他發現自己處亂世，身如浮萍，比如淪陷時期的北平，為了護衛清華校產而與日寇起爭執，卻徒勞無功；後來在昆明的西南聯大，飽受物價飛漲和每日空襲的摧殘。

溫德的晚年愈加悽慘，他不但是個洋人，還是個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飽受欺辱。在清華大學，他被剝奪了教學的權利，只能編寫英語學習材料，以便同事們就教學問題來求教時給予一些指導。但這時的溫德已經學到了中國式的隱忍，在住宅附近的荷花池邊散步成為他的一種幸福。但癱瘓在床之後，他唯一的樂趣也被剝奪了，內心的平靜終於崩塌。

我靜靜地聆聽溫德先生講述他的人生，也保證會把這一切付諸文字，希望以此給他帶來些許慰藉。他是多麼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而命運選擇了我來做這個事情。我無比感謝能有這份幸運。感謝北大校方，感謝我曾訪談過的溫德的多位同事與學生。他們讓我得以認識溫德先生，對溫德先生的認識拓寬了也豐盛了我的人生。

引言

這段旅程始於 1980 年 9 月，彼時我教英文的沃巴什學院收到一封來自羅伯特·溫德的信，他稱自己為學院最年長的在世校友。儘管七十五年裡沒有一個人聽聞過他的音訊，他的說法卻證明是事實。他解釋道，這些年來自己主要在中國的一流大學任教。^①

他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推薦王汝杰入學。溫德已經指導了王汝杰幾年，認為他已經準備好了接受美國教育。王汝杰的表現無愧於溫德的讚賞。他不只是一個優異的學生，更是一位能幹敬業的老師。我和王汝杰談論書籍和羅伯特·溫德——他曾是王汝杰父母的同事，並擔任過好幾年王汝杰的導師。^②我對溫德很著迷，這位神秘的老人 1923 年去了中國，從此幾乎長居於斯，除了二戰期間曾短暫返美。當然，我們也談論中國。在那種語境裡，我好似一個初學者，久久沉迷於唐詩，亞洲泛靈論（我曾去印度旅行），以及“文革”，但實際所知往往寥寥。

那段時日我受《西行漫記》影響很大。久為學者圈中一員，我相信，作為一個階級，如果我們和農民多待一陣兒，分享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我們會變成更有趣更進步的人類。我在一間沒有暖氣的粗陋木屋中住了幾年，我珍視在那兒的收穫，與“教養不高”的鄰居一起過較簡單、不那麼舒適的生活，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我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他國家展開艱苦旅行，還認為自己在毛澤東眼中，應該不像我的許多同事那樣

^① Robert Winter to Trustees of Wabash College, August 30, 1980,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② 王汝杰父母分別是王岷源和張祥保，都是北大英文系知名教授。——譯者註

亟需一場文化革命來洗禮靈魂。

實際上，我充滿了各種對中國的幻想，即便聽王汝杰講述他當紅衛兵的經歷，我也未能全部擯除這些幻想。例如，他曾經和一群紅衛兵圍攻、審訊身為北大知名教授的父親。但他“文革”故事中淋漓盡致的狂暴讓我著迷。在這所位於印第安納州一塊玉米地的小學院裡，我感受到終身教職的安穩和拘束，令人索然。在某個時刻，我知道，就像一個人一輩子有那麼一兩次會意識到自己真正需要甚麼，我需要去中國。

我的妻子，已經在日本生活過幾年，也對去中國倍感期待。至於我們五歲的女兒安娜……好吧，二十年前我曾帶著兩個小孩去希臘的塞薩洛尼基，我憑富布賴特獎學金在那兒的一所大學教了兩年書，這種連根拔起的生活並沒有傷害到他們，因此我準備再次檢驗自己壯遊的信仰，且帶著孩子。

諸事具備，尚缺教職，王汝杰差不多為我謀了一個。他的父母都是英語系受人尊敬、處於半退休狀態的教授。通過他們，我獲得了一個一年的職位。通告很簡略：“校長邀請您下個學年授課。正式邀請函稍後奉上。”我還記得收到任職電報的那一天。這個巨大飛躍的真實性，讓我倏忽不知所措。我想我臉色蒼白。那時正來學院訪問的羅伯特·布萊 (Robert Bly)，對我說了三個詞，巨大而永久地改變了我的人生：“That's just fear。”（那只是害怕）我第一次意識到，那不是害怕，而是恐慌，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當我們在甘迺迪機場踏上登機通道時，相同的震動不出所料地擊中了安娜。“我去那兒過夏天，但不要待一整年”，她宣稱，並死死抓住通道扶手。我不得不把她掰下來，當然很難受。她不肯安定，直到空乘給我們送餐。冒險剝下餐盤錫紙，探尋下面的神奇食物，她沉浸其中，看起來總算發現了這一趟的好處。

我們在華的最初時光有許多值得一說：安娜如何進入一所容納五百個孩子的幼兒園，好幾個月都一言不發，直到會說幼兒園通行的漢語；我

們如何騎著自行車勘察校園，發現圓明園毗鄰北大，被毀的宮殿和破損的石獸如何成為安娜最愛的遊樂場。我們起初都因太無知而體會不到文化衝擊。我們眼前的一切是平靜的，即使人們整齊劃一地穿著毛式的中山裝，甚至有顯而易見的軍事主義，而校園廣播一天兩次高吼指令和節拍，要求所有身體健全的人一齊做操。當時還發生了一些神秘之事：比如，我的學生會給我帶來一些官方的紙條，我必須簽署，然後還給那個坐在訪問學者宿舍門口的小幹事——而我花了幾個月才接受事實，即“文革”只是在名義上結束了，我的學生和同事們仍然被緊緊箍在那個令人謹小慎微的系統中。

改變需要一段時間。我多次私下和學生聊天，但其內容必然限於我所能理解的範圍。當這個範圍擴大，有些學生，包括那個如同“私人導遊”、文化翻譯的聰明年輕人，開始教我們一些東西——例如，他指著黨內高官集體亮相的新聞照片，說有張面孔不在其中，這是已經發生的一場政治大變動的唯一線索。另有一次，他告訴我，有位畫家被捕，因為他描繪標準場景時多了幾筆陰霾，在當局看來這就是政治批判。

我之所以需要一些時間來看透現狀，還因為，我們有一陣和其他“外國專家”一起下鄉，很多人歡呼當局的仁慈。例如，有次訪問一處解放軍基地，我們目睹某個突擊部隊正在訓練障礙項目和白刃互搏，令人印象深刻，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軍民魚水情。我們離開時深覺中國是和善的。畢竟那時，即便老練如費正清也對毛澤東的革命懷有同情，就像溫德一開始的感覺。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 1984 年的夏末和秋天。更具真實感的事情呈現在我眼前，始於我第一次拜訪羅伯特·溫德，他的寓所在校園北隅。我見他時，他 97 歲，兩年前被自行車撞後就臥床不起。他常常昏睡或迷糊，絕不像個適於交談的對象。我第一次拜訪他是正式的，目的是給他捎去沃巴什學院院長路易斯·索爾特 (Lewis Salter) 的口信，帶給他索爾特簽署的

榮譽博士學位證（不久它就掛在溫德床頭上方，我不知道這是否出自他本人的意願）。

溫德一開始就吸引了我（主要是第十八章所寫的第一次拜訪），我旋即意識到，我要盡量多地和他交流。我的想法有些自私。如我所說，我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溫德的經歷讓我看到中國的前景，他在中國度過了動盪喧囂的20世紀。不過我也有不那麼自利的動機。溫德陷入了困頓，病痛和周遭環境讓他無望——他知道這些，也時常抱怨，要我想方設法幫他解脫。講他的故事，對我來說，是我給予他某種解脫的唯一方法。他對自己這一生是否有價值心存疑慮，而我在還不太了解他做過甚麼有價值的事之前，便早已覺得——他此生是值得的。

一開始，我可以拼湊的故事如同幽靈。他腦海中不同時期的人和事件互相交織成一個奇怪的原型。更悲催的是，我對中國歷史實在無知，所以基本無法將訪談材料聚攏起來，只能盡其所能地被動記錄。

我，夢一般地騎著單車，沿著清風拂過的荷花池，去向校園西北角的小屋，在並不太久遠的過去，這一區域尚是皇家獵場的一部分。在門口，溫德的傭人會跟我打招呼，這個姓王的女人並不很情願見到我，因為我的來訪會讓老人變得躁動而難以平靜。不過，她對我仍算和善，希望從我這兒找到下家，她的命運往往取決於先生們的好意。

進了屋，她會帶我穿過一間小的前廳，那是她和丈夫住的地方，走過一條短的廊道，它從右切入一處櫥櫃般的空間，那是老溫德曾經的書房，現在的臥室。這房間窗子緊閉，有一格玻璃由結實的木板取而代之，這樣老人就無法因為暴躁、尿味襲來而打破它。他時常昏睡著，一個大塊頭，穿著有夾層的中山裝，填滿了、甚至看似要溢出那小床，他滿面憔悴，幾如死人。

一套古典雕花的柚木壁櫥覆蓋了整面牆（我無法想像溫德如何在戰亂和逃亡中將它保留下來）。他早期生活的其他痕跡掛在牆上。有幅清代的



溫德的藏畫

畫，畫上是一位穿紅色斗篷的大鬍子男人牽著駱駝翻越雪山。人和駱駝都帶著一股聖潔的傲然之氣凝視著澄澈的山巔穹頂。這是一幅行者的圖畫，它讚美那種孤獨和無畏的追尋之旅。它對面的那幅油畫，王岷源告訴我，那是溫德還不到五十歲時的自畫像：如上圖騎馬者那樣大而粗的鬍鬚，有著那種專橫的、英國式的英俊。溫德的另一幅畫，現今屬於我了，上有一位年輕的漁夫直視著我們，右手握著一隻小海馬，明顯是表達情慾。

其他東西只有幾樣：一個卷軸，上面的幾個大字為：“辭舊迎新，百花齊放”；沃巴什學院的獎旗和獎狀掛在溫德床尾那面牆上；一台彩電，這是最後一扇為溫德打開室外天地的窗戶。

* * *

在那個房間，我們展開了最特別的交談。有次我來訪，他思索起“現在正影響我的人”。這些人，他說，不都是好影響。“他們有他們的錯誤——某些錯誤。但我對這些錯誤的糾正未必更好……就好像中國已經看到了它的未來，不論我說了甚麼做了甚麼。”說這話的人衰老而極度無力，除了我之外已經很久沒有影響過別人了，因而這些話聽起來近乎荒謬地誇大，要不就是瘋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溫德的意識不再受時間所限。在任何時刻，他都會說出他曾經生活過的各種時間框架。影響過他的人包括：他的傭人，對他的生計直接負責的大學當局，以及中國政府本身。當我想到他常年工作在為中國鑄造政治和智識前途的那個體系的中心，他的話就變得格外有意義。

在我看來，在這些拜訪中，第一種聯結形式是：佈滿這個小房間的，構成了一部龐大的歷史，橫掃時間，跨越大陸，經由遠大希望和破碎幻相的辯證法，將東方和西方都運送到我們站立的這一時刻。沿著這些線，一個沉睡、衰弱的人物形象對我來說堪比寓言。

溫德的任務，如同他及他的東西方僱主們所了解的，是在兩種文化間開展雙向闡釋——一種是他生於斯又半斷絕來往的，一種是他試圖在其中塑造自我、獲得包容的。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比任何人都久，最理解中國”，他以前的學生們這麼告訴我。他想寫一本書，希望它能有助於深化兩個國家之間的了解。

確實，一種新文化的前景，東方和西方的因素都熔鑄其中，這兩方又各有瑕疵，此前景縈繞在大西洋兩岸的知識分子的心智中，比如西方的約翰·杜威、伯特蘭·羅素、瑞恰慈（I.A. Richards），在東方書寫這樣一種新型文化的是梁啟超、梁漱溟、胡適，直到戰火高熾，所有思想付之一炬。無論如何，經過了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及至“文革”結束，溫德已然 85 歲。

他不止一次對我說，“你能想個甚麼辦法讓我離開這兒？”我當然不能。這所房子，這些傭人，他身心的糟糕狀態，他的人生將他引到這兒，而且不能再引到更遠了。他好像海岸上一條失敗的大魚，呼吸著他最後的痛楚。我想不出任何辦法讓他離開這兒，除了盡量精準地想像他的生活，將他垂死的現在搬回那活力四射的往昔。

* * *

一個春日，我給下午的班講完課，騎車去了溫德的屋子。我答應為他推輪椅散一會兒步，此時花兒含苞欲放，在乾旱的北京土壤裡，近乎奇跡。溫德幾乎一年沒有從屋裡出來了，他極度渴望離開他的房間。我們計劃散步的那一天，他告訴我，他不想談論過去，他寧願有點兒新東西，新的比老舊的一切都好。“必須要有些改變了，……沒有甚麼比過去的那些更糟了。”

他不是說過去是壞的——他尤其不想被誤解成這樣——而是說他陷落在一系列灰暗、一成不變的歲月中，眼睜睜看著自己退化。他有點像庫米的女巫 (the Cumaeian Sibyl)，縮小了，懸掛在瓶中。但與她不同，他不想死。就在幾天前，他透過窗戶瞥到一張褶皺的泡沫塑料丟棄在他的老房子前，這幾乎是他從窗子裡能看到的所有。“外面的那個白東西是甚麼？”他想知道。我解釋了，但他仍很焦躁。“它用來幹嘛？有人死了嗎？”不，它甚麼也不是，就是工人丟的垃圾。“它是為我而放的嗎？”他堅持問。

但到了我們要外出的這一天，他卻忘得一乾二淨。“你迷信嗎？”他問我。我告訴他我不迷信。他解釋道，過去曾帶他出去散步的某些人，很迷信，因此拒絕推著他過橋或跨水，說那兒有惡靈潛伏。但溫德家坐落於幾個小荷花池的中間，如果不過橋或跨水就不可能帶他走很遠。

結果似乎是，惡靈作不作祟不取決於橋，按原計劃應散步的那天，颳起了一場北京大風，我去告訴他，我們不能外出了，因為戈壁風沙之類的。不過，當我到了那兒，卻發現天氣不礙事。溫德從前傭人（已經去

世，溫德曾與他長期“交戰”的兒子，在院子左邊的一個甚麼地方，正挖著花，想偷走那個支撐著大而老的丁香花叢的架子。而溫德不知道或不在意我是誰，儘管他意識模糊地覺得我是一次演講比賽的冠軍。他的身體，鉛色的，比我此前所見都要有生氣，他對我發號施令：“別坐在那兒。時間在浪費。叫當局。不。走，馬上。”

這個老人糟糕的精神狀態，已成為一種慢性病，有一個明顯的主要肇因。他身上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情發生了。他已經不能動了。對他來說，在進入暮年後的大多數時間裡，生命和能動是同義的。“我記得”，他告訴我，“我曾生活得很不錯，在這個地方周圍散步，遠到你目力所及，到了水邊，到了水”^①。他思忖了片刻，繼續說：

我不能走路以後就完全變了個人。能走路時，我可以去任何地方——這兒那兒——去看各種東西。現在我哪兒都去不了，甚麼都看不到。我想，不能走路是很糟糕的——我能在這世界行走的時候是多麼有意思。我可以走到任何一個角落，檢視我從遠處看不見的那些小細節。我發現這比我在美國找到一個差不多的地方要有趣多了。

溫德經常談論他一想到自己是不是“足夠好”就不安、焦慮，我用這個寬泛的短語是指，他是否從容卸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道德和心智的使命？因此，可以重構他的生活，以能夠實現的形式讓他找到出路，逃離縈繞不去的自我懷疑。我第一次拜訪時，他告訴我，他想“清除自己”。他從無個人抱負，他說，他想“變成空無”。人們為甚麼現在來看他？他真的想知道。而儘管他想成為“空無”——這個抱負充滿了所有東方式的混沌——現在他想從我這兒，從任何人那兒知道，他的人生是否有意義，

① 溫德此時說的是“shui”——“水”的拼音。——譯者註

人們怎麼想他。他想聽到一些補償性的評判，因為顯然，這位前天主教徒有時害怕因自己是同性戀而被投入某個真正的地獄。他的傭人王阿姨，曾是個妓女，而他與她——他曾說——因為彼此的罪惡而接受懲罰，湊在了一起。

他的某些懊悔以一種更世俗的方式降落下來，通過多個對他的批鬥會（有進攻性的審問），其間他一再被教育，要承認自己曾經的行為，過去秉持的價值，都是他反革命傾向的證據。因而我能想像，我倆之間可以建構一個世界，我們在裡面一起散步，檢視事物的細節，彌補他的過往。

藉 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話說，我該如何“撿起這些碎片以支撐（他的）廢墟”？他就像我舌尖的一首詩，醒著的一場夢。曾經，當我離開戴乃迭和楊憲益（大量英譯了中國文學的翻譯家）夫婦家，楊夫人祈願我的傳記計劃順利，但她哀傷地搖頭說，“你在雲霧中做事”。

而我確實是在雲霧中做事——一位老人的碎片記憶，一些報紙故事，他在世朋友的逸聞趣事，他們也是已經老了或正在老去的男男女女。

有時溫德努力想參與。“可以問我任何問題”，他會說。我便問，但他卻忘了我問到的情節、人物或時期，他會道歉，退回他自己的廢墟中鬱悶思索。“不知道為甚麼我這人真奇怪”，他有天告訴我。“你瞧，我似乎混淆了傳說和事實。”

我當然意識到我來得太遲了。他生活的真實形狀正在消融，有些已經完全消融掉了。

而他稍微清醒時，知道我要寫他的傳記，他也想這樣：

我是一個想成為中國人的美國人。但我不是一個好人。我害怕的就是我自己不夠好。所以有人會出現並想弄清楚我夠不夠好。不知為何我感覺你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問題是你夠不夠好。

* * *

幸運的是，我在中國的那一年（1984—1985）是一個新紀元的開端，或者說那時看似如此。假如早幾年來我的計劃都得不到甚麼合作。早前試圖獲知這個故事的人已經被攆走，他們說這裡沒有故事，而有些找故事的人又到得太晚。而我，則享受著校方的幫助。藉此，我能夠獲得溫德的某些文件——雖然不是最關鍵的，如我後來所發現——他設法保存在兩本相冊中的照片。藉助校方，我能夠採訪那些了解中青年時期溫德的人。

我從這些採訪中獲益匪淺。北大英語系主任李賦寧教授，用完美無瑕的句子、豐滿的段落，提供了溫德人生的完整輪廓，為我繪製了一幅我身在中國時應履行的採訪工作圖。我在北京、天津採訪了幾十個人，我聽到的逸聞趣事有助於我復原那遺失的人生。但或許獨有那麼一個瞬間，後來回想起似乎最成熟——一位年長的周教授告訴我，溫德曾和一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項目有聯繫，即中國正字學會（Orthological Institute of China）。

聯繫 J. 威廉姆·赫斯（J. William Hess）後，洛克菲勒檔案館副主任讓我得以接觸到溫德在四十年代上半期寫給洛克菲勒基金會官員，以及瑞恰慈等朋友的報告和信件。通過赫斯先生，我發現溫德的一部分日記，從抗日戰爭後期在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大，到 1949 年秋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宣佈中國人民從國民黨的統治下解放了。日記令我特別激動，因為我已經聽說了近一年——甚至來自見證者——“文革”時紅衛兵燒掉這個文件是多麼可惜。

我 1985 年夏天一回到美國就拜訪檔案館並且發掘出數千頁的文件，足以保證來年夏天的第二次訪問。因為很多材料是與中國正字學會本身相關的，我被捲入計劃生發出的第二層考察中，它派生於瑞恰慈和奧格登（C.K. Ogden）1923 年出版的書《意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這年溫德去往中國。

稍後，1986 年 12 月底，按中國的算法，值溫德百歲生日，我得以再

次赴華訪問幾個星期（為他慶生的細節，見第十八章）。儘管他的情況在惡化，我在北京的那幾週仍和他談了幾次。最後一次談話時，我告訴他，我為《中國日報》寫了一個有關他的故事，問他想不想聽。他說想，但聽了一兩句後他顯然無法集中注意力，我就打住了。當我準備離開時，他要我許諾，我還會回來。我許諾了，他便牽起我的手吻了一下。

次日，離他生日還有兩週，他陷入昏迷。我在他的房間時，醫生到了，聽他心跳很弱，便叫救護車送他去校醫院。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活著的他。英語系的兩個老師抬著擔架，迎著風走出他曾經的院落。

在同一個清冷的日子，就在他被抬出擠滿人的屋子之前，他的護理王阿姨，將手指放到唇邊，把他藏在屋裡的一堆文件給了我。蔡斯特^①站在我旁邊，把他自己的公文包偷偷遞給我，我把文件放了進去。這些包括溫德的日記，他在五十年代“反右”鬥爭中寫的檢討，還有一些信。除了我在洛克菲勒檔案館發現的文件，還有我以前學生戴維·肯德爾和華盛頓的康諾利幫忙，使我通過 FOI (freedom of information，信息傳送和使用自由) 獲得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文件，從王阿姨那兒得到的文件使我擁有了完整的原始文獻。就像溫德的記憶，它們很豐富，但要探知溫德 1923 年抵達中國後的生活，它們仍然是碎片樣的窗戶。

* * *

鮑勃·溫德 (Bob Winter)，朋友們這麼叫他，在他的生活世界中是個名人。用項美麗 (Emily Hahn)^② 的形容，他有著“異於常人的內分泌系統”，長期以來使他暴露不出年齡的痕跡。他消息靈通，喜歡說話，這使他成了一個令人愉快的演藝家，一個能使項美麗（不公的是，她有他所無的長處，即她善於傾聽）這樣的其他健談者靜默下來的健談者。他很自然

① 蔡斯特 (Walter Zeisberger) 在北大教了多年德文。

② 項美麗，著名作家，1935—1941 年生活在中國。和溫德一樣，她也是個冒險家。

地吸引著身邊同伴，比如項美麗女士，傑出的漢學家費正清，知名的文學批評家瑞恰慈，以及那些地位相當的中國知識分子。

如同中國走馬燈般的近現代史，溫德過著多樣的人生——大學教師，非正式任命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文化特使，園丁，健康食物倡導者，以及最卓越的業餘動物飼養員。抗戰期間，他甚至當了一把間諜，他喜歡幹這營生就像他喜歡幹其他任何事——富於才華、激情，以及仁慈。他從日本人手上營救蒙古活佛的故事應算是間諜文學的經典之作，他還另有六七個故事和這個差不多，包括偷運軍火、發報機、軍工品給山東的共產黨游擊隊。正如項女士在 1940 年代所說，“浪漫在中國沒有絕跡。溫德就是浪漫的化身”。^①

隨著共產黨 1949 年的勝利，浪漫迅速褪去。當溫德決定留在中國，他發現自己得到的待遇越來越接近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這意味著他不得不同樣要面對一度威脅他們的反右運動。在“文革”前，他已經頻頻被拉去參加批鬥會。在此過程中，溫德半是堅信了——儘管只是在他最黑暗的時刻——他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做的工作，甚至他對中國實施的間諜工作，不管怎樣都算是他反革命傾向的證據。實際上，他確曾定期向美國當局遞送一些他知情的政治信息，這些相當可觀。

有陣子，他對共產黨政權抱有很高期待，他們至少更替了腐敗且日趨恐怖主義的蔣介石政權。但這些希望很快消逝。解放時他年已花甲，生命的最後幾十年將黯淡地在中國度過。他僅剩的教學工作（正式教職結束於 1957 年）被縮減到為英語課本撰寫習題，為年輕的英語讀說者提供音標。如果說他的精神被折磨，但卻未滅絕——至少，直到他 94 歲，摔折了坐骨，從此臥床。此前他至少仍是他那光輝往昔的一座紀念碑——他是出類拔萃的老中國通，他是當政治環境允許時，每個國家的親華者都會來拜訪

^①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The Blackston Company, 1944), p.107.

的人，他仍風頭十足，這位高大、銀髮的美國人，騎自行車穿行在各種天氣下，每到夏日午後便在昆明湖附近游泳，他仰在水面看報紙、抽煙的天賦，能吸引一群人圍觀。

1941年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寫道：“現代文學在本質上是個人之物。它要麼是一個人所思所感的真實表達，要麼甚麼都不是。”不過，表達這個觀念時，他馬上又補充說，“一個人意識到文學是如何受到威脅的。因為這是極權主義國家的時代，不給予，也無法給予個人任何形式的自由”。我想這個說法也適用於溫德所表達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他不僅相信個人的自由，那是他講授的文學所展現和贊同的，也相信文化的力量能戰勝暴力和極權主義趨勢。對他而言，正如世界大戰之間的其他思想家那樣，東西方的文化交融有可能彌合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鴻溝，標誌著一場邁向更宏大文化秩序的運動，而它將製造和平。

但是，從長遠看，戰火澆滅了這種教育。人文主義被恐怖主義吸納，以各種形式展現於各種鬥爭的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中。溫德及其人文主義所信奉的最後不能說策動了當時交戰中的任何權力和國度——日本和國民黨沒有，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所以溫德終究是一位教育家，他活著看到了自己教育原則的核心被世界歷史所嘲弄。這一核心，如他後來在日記中所表露，“教育的主要目標應該是……確保那種想要支配他人的慾望不會抬頭”。

我的這本書有關苦難，有關一個西方的靈魂如何被磨煉成東方的隱忍，但也有關幸存在他身上的、那幾乎堅持到死的一種叛逆性的信仰：雖然遇到歷史中的強勢方，但清醒的、有認知力的個人有可能是對的一方，因此對絕對權威的反抗也可能是對的，即便他的觀點是對現狀的對抗——不管這反抗有多麼危險。

第一章 流亡的印第安納人^①

那個冬天的空襲多發生在上午十點至下午三點之間，溫德據此制訂計劃，上午工作兩三個小時，下午從三點工作到六點。他習慣了隨時揣上那些他眼中的重要之物，對他來說，那就是他的打字機、眼鏡；一個公文包，內有他所管理的中國正字學會的文件；一件軍用防水大衣，他在壕溝裡躲避槍林彈雨時可鋪在身下。這成了每日必經的程序，他在家信裡說，“和歐洲的情形相比”，只是小兒科。

儘管如此，對他這樣一個“新來者”而言——他從北平南下昆明不過是兩個月之前的事——“見到目瞪口呆的女人如看門狗般坐在自家爆炸後的彈坑裡”實在愉快不起來。由於沒有成過家，溫德免去了這種注視。他個人遭受的最大損失發生在 1940 年 11 月他剛來沒多久時，小偷劈門而入，用撬棍弄開了他的行李箱。他幾乎丟失了所有私人財物（包括赫爾墨斯便攜打字機），不久前他搭卡車在滇緬公路上顛簸十四天尚能保住這些東西。在這一段歷險記裡，有爆炸的橋樑，瘡疾，沒完沒了的官方拖延，司機企圖偷他的行李，明明白白看到“五輛卡車在一天之內相繼跌入懸崖，或是墜崖後躺在那兒”。^②

他形同小醜，穿著朋友們給的款式各異的衣服——不過，在昆明，1940 年的冬天，一個髮色灰白、憔悴、衣著混搭、身高超過一米八的美國

① 原文為“Hoosier In Exile”，在美國，“Hoosier”指印第安納州人。——譯者註

② 見溫德 1940 年 11 月 24 日寫給 Ivor 和 Dorothea Richards 的信。我所擁有的此類材料存於洛克菲勒檔案中心（RAC）特藏：Herbert Stern 藏書（未分類）。

人不算是一道奇異的景觀，因為此時此地混雜著軍人、本地居民，來自山區的少數民族，還有遷徙而來的大學師生——他們很多是步行至此的，從北平到西南地區有兩千多公里，他們要在日軍攫取了北方的廠房機械之後保存大學的實力。

通常，空襲警報會盡早拉響，以便城內居民取道東門逃入山林，一路上得半個小時。偶爾，飛機也能避開耳目，在第一道警報響完之前就進到城內。那便是一片混亂。人們逃向狹窄的東門，頭頂貴重物品。

老婦人背上綁著嬰兒，鴉片吸食者帶著煙槍。跛子，學生帶著整包書，裹腳的主婦懷裡揣著鐘，或有其他寶貝藏在身上，與富人的汽車、官方的卡車混雜在一起。^①

在溫德抵達之前的幾週，他最親密的朋友，蘇格蘭人吳可讀（Arthur Pollard-Urquhart），剛剛死於左膝傷口惡化而致的併發症，他受傷是因為某天剛到門口就被一輛卡車撞倒。^②

溫德則像個喜劇角色，當警報如塞壬歌聲般響起，他和助手往山上跑，抬著一台沉重的辦公打字機，溫德從英國領事館借了它來代替那台丟失的赫爾墨斯。有時他陷入窘迫——有次是在墓地，他置身墳墓之間以躲避流彈，經常或輕或重發燒，因為熟睡時被耗子咬到，染上了當地的斑疹傷寒。正如一位中國朋友對他所說，“在這兒，現在沒有時間變老、染

① 見溫德 1940 年 11 月 24 日寫給 Ivor 和 Dorothea Richards 的信。我所擁有的此類材料存於洛克菲勒檔案中心（RAC）特藏：Herbert Stern 藏書（未分類）。

② 見溫德 1941 年 1 月 15 日給 M. C. Baflour 博士的信，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病、死亡”。^①

在滇緬公路染上的腰痛，發展成了坐骨神經痛，讓他幾乎筋疲力盡。某天，值他甫抵昆明一週，已近乎跛行的他，拖在朝大門蜂擁的人群後面，而他從來沒有去到山林那麼遠。在那個非同尋常的十二月，每當飛機襲來，他坐在潮濕的稻田裡，一動不動，而飛機的槍膛正在射擊，不時往人群扔下手榴彈。兩個學生死了，但溫德，像往常一樣幸運，看著飛行員兩次對準他，卻與他擦肩而過。因此他安然無恙，只是六個小時裡警報解除的鈴聲都未響起，之後他又冷又濕地跛回家。次日，他行動困難，好在他的朋友、英國領事好心借給他一個熱水瓶。在昆明，誰的愁苦要是能有熱水瓶的慰藉，那是相當不錯的。

遭受種種的溫德仍從中國人那裡得到慰藉，雖然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甚至無法遵循傳統敬畏死者。此時已經沒有葬禮。遺體的處理“盡量安靜而迅速”，溫德得知皮雷先生——“一位在昆明辦了多年英語學校的法國老紳士”的死訊，還是因為他偶然遇到二十多名學生，肩扛著一副棺材跑向城門。一支竹棍上插著小布旗，上有中文寫著皮雷的名字，表示他們正要將他的遺體帶出去行葬禮。

有太多需要適應的，但“最令人驚詫的是所有人，尤其中國人，很快就適應了。可能是嚴酷的環境讓情感沒有容身之地。我在經受恐怖的一天後無法入睡，但我尚未發現學生們也有相同的反應。我有這種情況，高海拔大概是一個原因”^②

他十七年前以某種文化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可以講莎士比亞和但丁，米開朗琪羅和蒙田，貝多芬和莫扎特，有著吸引人的明晰和激昂。他

① 溫德 1940 年 11 月 24 日給瑞恰慈夫婦的信。Volume II, 1940—1946, RAC Special Collection (unsorted).

② Robert Winter,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 from March to May, 1941”, Rockefeller Archives, 601R, RG1, Series 601, Box 48, Folder 405.

是來講課的，也是來學習的。他在中國發現了一種西方所匱乏的日常文化和禮節。但現在一切文化念頭都要拋之腦後了。重要的是得活下來。即便一個人身體可以適應，情感的適應卻需要更高的代價。要麼遏制消沉的想法和感受，要麼持續向恐懼敞開，不給想像力留下一席之地。

空襲過後，從山上回到城裡，你會遇到：

一個女子的半身，沾滿泥土，空洞地笑著，倚靠在樹根處。路邊有一個塵土翻飛、吐著黑水的池塘，亂蠅無數，水面上泛著白花花的米粒。在池水中央，有一隻鮮紅的小手，手指向天。蓋上她的臉……薄棺為何太麼窄？沒有關係，多的是殘肢斷片，但這個赤身裸體的胖男子，肩膀還是齊全的，所以只能用鐵鍬用力壓下去。……在我家門口，一個人跪著，屁股高高抬起，就像祈禱中的阿拉伯人。他的頭不見了。他們說，這是我的木匠……一個女人爬上被炸毀家宅的廢墟頂上，一直在挖刨著，她漲紅了臉，臉上閃耀著落日最後一道餘暉，悲極不成泣。^① 雙眼中有深不見底的痛苦，諷刺的是，她的唇上卻盡是木然。

今夜還有時間，“用你的手擦拭你的嘴，抿笑”^②，當你在鎖孔裡旋轉鑰匙，吹熄蠟燭，子彈退回膛，你跌落地上，一口酒突然上頭，掬一把熱淚，直到你再度站起來。床鋪雜亂，“在如呻吟的吱呀聲中，思緒煩亂”^③。

溫德經受著這些，也一直在觀察與記錄，在悲慘的中心地區繼續目擊，而大多數旅居中國的西方人早就棄之而去了。到了 1940 年，中國很

① 最後一句來自 Gerard Manley Hopkins 的 “Terrible Sonnet”，“No Worst, There Is None.”

② 此句來自 T. S. Eliot 的 “Preludes”。

③ 此句來自 G. M. Hopkins 的 “Spelt from Sibyl's Leaves”。

明顯不再像戰前那樣是外來唯美主義者眼中的天堂。但溫德留了下來，還教書，儘管他認識到他的態度讓許多人想起紀德筆下“普瓦捷的被囚者”，當她被解救出來時，已在那個黑暗骯髒的屋子裡關了二十年，她堅決不讓護士們剪掉她臟亂的頭髮，給她洗個澡，她有生之年不斷在乞求，想回到她“親愛的小窩”。^①

他為甚麼留下來？溫德與朋友瑞恰慈思忖著這個問題，瑞恰慈已開始暗示他，現在是離開的時候了。這僅僅是一種條件反射嗎，像那位隔絕者？是那種叫做“戲劇性的本能”使他害怕“有序世界的沉悶”嗎？他留下來是因為他“在物質條件惡劣的這張粗糙帆布上”“揮散嘴角眼角的多愁善感”嗎？僅僅是虛榮嗎？他在聯大這所流亡昆明的學校裡每週講授詩歌課，他的課不得不一再搬到更大的講堂以容納更多的人群。

他仍留在中國，純粹是出自“他畏懼被時光拋下了十八年，還得掃清腦中的蜘蛛網嗎？或者他暗暗害怕成為自己在廣播裡聽到的那種美國人？或者害怕文學在更優越的環境裡發揮的意義不會那麼大？”或純粹是因為他不可能遺棄那些人們，他們堅持活下來捍衛國家，咬牙“飲下死難同胞的骨血”。他再也沒法轉身而去，“在這出戲演完之前，不管他們中有多少人會是狡詐冷酷”。^②

他留下來，因為以上的理由，而還有一個更關鍵的理由是，他在中國找到了一個位置。在北平，他屬於一所大學，它器重他，它以中國式的迂迴使他有臉面地免於飢餓。“這是肯定的”，他告訴瑞恰慈，中國是世界上他唯一能指望獲得那些東西的國家，這一點算是彌補了在這兒生活的弊端。

因此，五十七歲這年，他決然地宣佈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居民，遠離那

① 溫德 1941 年 11 月 11 日給瑞恰慈的信。Vol. II,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② 同上。

並非遙不可及的出生地印第安納州克勞福茲維爾（Crawfordsville），從此疏離他的國家和同胞。

* * *

溫德出生的 1890 年，是他家的毀滅之年。先是大兒子約翰，一位以父親之名命名的鐵路工人，死於西部的一起火車事故，出事地點臨近科羅拉多州的弗洛倫斯，之後他被埋在此地。快到 11 月底，最小的孩子麥克斯，才八個月大，死於肺炎。而最打擊他們的是父親約翰之死，也是肺炎，在麥克斯死後九週就跟著進入了墳墓。羅伯特·溫德，才三歲就記得，他母親的歇斯底裡症始於這多災多難的一年，並且“一直持續到她去世”。^①

溫德兒時或許多少得到過某種母愛，但他知道自己沒有父愛。約翰對他來說從未存在過。這個男孩沒有關於父親的記憶——或者只有一次，某個下午他由一個姐姐引入客廳，“有一具棺材，是我之前從未見過的，她抱起我去看那個死者的臉，告訴我這是父親。因此我從不知道他，除了那一刻我被舉起來看死去的他”。^②

這淒涼的時刻讓他開始成為一個陷入深深孤獨的失怙男孩。溫德這一生，為得到周圍人的關注，可以做一切他能做的，他這一生也還是孤獨的。他這一生都會向人伸出援手，而這種已形成定式的人生經驗可能出自一系列非凡的男性友誼。但孩童時，他生活在女性的陪伴之中。

儘管家裡損失慘重，約翰（做木匠活）為家人建造的那幢普通的兩層樓，就在沃巴什學院西邊的沃巴什大道上，仍在升值——雖然不幸的是不及工薪階層的收入漲幅。約翰撒手而去，遺孀凱瑟琳已經 40 歲，家裡有八個孩子，其中六個是女兒。只有 22 歲的凱瑟琳，和比她小五歲的瑪格

① 羅伯特·溫德《恐怖》（打印稿，1977？）。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② 訪談，1984 年 12 月 12 日。

麗特（或叫瑪吉）在 D.W. 朗特裡的商店有份工作。母親凱瑟琳待在家裡照顧其他女兒——安娜、約瑟芬、瑪麗，還有伊麗莎白，大至 15 歲，小到五歲——以及兩個活下來的男孩。

弗蘭克，七歲的大兒子，盡量照料好自己，避開一大家女人。這讓四歲的羅伯特（第九個孩子），家裡最小也最受寵的男性，過著一種“大佬倌”的生活，由此發展出了這種生活強加給他的性格缺陷。溫德的一位老朋友，還記得他有次發完脾氣之後說：“我是這樣一頭野獸，因為我童年時代完全被寵壞了。我被養成一個暴君。只要我舉起一個指頭，她們就會服侍我。”^① 溫德就這樣長大，無需與一個限制他的男性權威作鬥爭。有極少的幾次他在被違逆時，無奈地跑出屋子，平躺在路中間，等著路過的二輪運貨馬車或四輪車來碾，以脅迫家裡那些一時怠慢他的女人趕緊遂他的願。他輕而易舉獲得的權力，應歸功於他對這家人近乎蔑視的冷漠。但使他在成長中被寵壞，缺乏家庭感的，不僅是父親的缺席。雖然他這一生對園藝的嗜好習自母親，也兼有母親對小道消息的品味，他卻很小就開始討厭她。^②

很難想像，像凱瑟琳·溫德那樣一個負擔沉重的女人怎麼向這個無父的男孩提供他所需的情感教育。但她確實有某些特質是溫德可以責怪的。凱瑟琳會找尋自己生存自立所需的一切，她確信自己出自異邦的阿爾薩斯家族，她喜歡擺譜。實際上（就像溫德確信自己是個男人）她家是“普通人家，……社會地位一點也不顯赫。但她不想讓人們認為我們只是普通工人，所以假裝我們家族在德國地位顯赫——還有其他一些不真實的東西——就為了讓我們在美國地位更高”^③。

① 與趙林克悌的訪談，1985 年 1 月 19 日。

② 溫德，訪談，1984 年 12 月 12 日。

③ 同上。

凱瑟琳自抬身價的手段使全家在困難年代過著飄浮的生活，就靠兩個售貨員的工資。這甚至也可能潛移默化了溫德天生貴族的心態，即便他履行自己深切的民主原則時也會展示出這一點。但在他的童年時代，母親這種驕傲的最明顯的結果是，它使溫德隔閡於當地其他男孩，她說他們比他低賤。後來他會以一種生理上的厭惡回憶起她的勢利。

但最讓溫德不快的，是凱瑟琳對她兄長的崇拜，他與卡斯特^①死在一起。他不知厭煩地複述這個故事。“我的母親生於 1834 年”，他 85 歲時回憶說。她——

16 歲（1850 年）結婚，從此隔年就生一個孩子，那時美國正在大規模屠殺印第安人，1890 年 12 月，我三歲生日的前兩週，他們殺了塔坦卡·約塔克（坐牛）^②那個月，我的父親，我最大的哥哥，還有個小弟弟，都死了。我還記得（比昨天發生的事記得更生動）我母親的歇斯底裡症由此發作，直到她死。她自己特別喜歡的那個哥哥跑去了蒙大拿，幫卡斯特屠殺印第安人。我三歲時，就開始聽她吹噓，他腰帶裡裝著他殺掉的印第安人的頭皮，直到 1876 年他和一小隊白人被抓住。他們的馬被殺掉之後，他們站著，印第安人圍著他們飛馳，以驚人的速度繞著巨大的圈，然後用箭一個一個地射殺他們。接著把他關起來，剝了他的頭皮報仇。

儘管溫德在敘述他家 1890 年遭受的一系列死亡時，因其營造戲劇性的稟賦而有些許不實，但大多數都是對的。或者，至少對我來說，當第一

① 卡斯特（Custer，1839—1876），美國著名的騎兵軍官，內戰時聯邦軍將領。——譯者註

② 塔坦卡·約塔克（Tatanka Yotanka，1831—1890），美國印第安人拉克塔胡克帕哈部落領袖，人稱“坐牛”（Sitting Bull）。——譯者註

次聽這個老人講故事時，很難擺脫他投射過來的魅力。當他講的故事快要結尾時，他躺在那張再也不會離開的床上，彷彿來自遙遠的過去，看著我，“我尚未梳理的我人生最大的疑團是，我——一個四五歲的小孩——怎麼知道殺印第安人是錯的。沒有人告訴我。似乎沒人告訴，我就知道了。……我的母親和舅舅認為，他們都該被殺掉——所有所謂的印第安人，美國的土著。為甚麼我一個四五歲的小孩覺得應該去了解他們呢？莫非我生來如此？”^①

* * *

“莫非我生來如此？”這個問題並非修辭學上的誇張。溫德的死正在逼近。他直視著我。他想知道。但誰能說我們生來怎樣？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就學會了討厭勢利、虛榮，以及常常戴著文明面具的野蠻。兒時，他還發現了甚麼會成為塑造他人生的主題：在印第安人和其屠殺者之間選擇前者，鄙視道貌岸然，不情願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事實上，他在成長過程中不僅會同情被壓迫的和被遺棄的，還要親身體驗被壓迫和被遺棄的生活。

“關於我自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作為一個小孩，我就這麼了解社會。我知道母親在偽裝我們所不具有的社會身份。後來我舅舅跑去俄勒岡，在那兒屠殺印第安人……”溫德開始早早地通過親歷者的眼睛來體驗傷痛、感受愉悦。

於是他成長為一個孤獨者。“當我是個小男孩時，我玩耍”，他告訴我，“但我母親不想讓我和其他男孩一起玩”。^②她相信自己社會地位優越，相信他也如此。晚年，溫德去掉了他中間的名字“卡爾”（Carl），算是對其母親小市民氣的最終忤逆。

① 溫德，訪談，1984年12月12日。

② 同上。

因此，溫德較少留戀往昔，作為一個天生的流亡者，他對故土的依戀是薄弱的，他於是可以在開始實踐那奇怪的使命。

克勞福茲維爾，這座位於印第安納州中心偏西的小鎮是溫德的生長地，人口有六千多一點兒，對男孩們來說好比天堂——某個年齡段的男孩。從他家沿著沃巴什大道步行不到五分鐘，就到了克勞福德樹林，溫德喜歡在那兒探險爬樹，常是一個人。近在咫尺的還有糖溪，它流過小鎮，流經動人的峽谷和茂密的楓糖樹林，也由此而得名。就是在糖溪他學會了游泳——構成他日後傳奇的諸多技能之一。

這也是最早令他賞心悅目的一片水域。他在這方面有著中國式的品位：沒有湖泊或流水的風景不是真正的美景。奇怪的是，溫德對風景和土地的品位似乎是他與母親的另一大共性。他記得與她一起做的一件開心事就是在花園裡晃悠，母親把花園侍弄得極好，他在那兒學到了日後在中國揚名的另一項技能。

對於克勞福茲維爾人來說，務農是比園藝更滲透在血液中的。克勞福茲維爾西南邊的土地平整而肥沃，已開始給耕種它的人帶來財富，每畝可收穫 25 蒲式耳小麥或 60 蒲式耳印第安玉米。另一方面，這塊土地還帶來了整個鎮子的繁榮。溪流為這一區域的許多穀物和鋸木廠提供了動力，還造福於揚特開辦的那家知名的毛紡織廠。到了秋天，當地的男人和男孩靠挖“參”（sang）可以賺到閒錢（現在仍是），把它們出口到高麗參市場。

在文化上，這個城市也有資源去惹起激昂者之心。華萊士將軍還是個九歲男孩的時候，短時期就讀過沃巴什學院的小學，當他作為一個名譽不佳的內戰將軍（備受指責，因為戰爭的第一天他就在夏伊洛·華萊士將隊伍引到了錯誤的方向）經歷了各種生涯之後，回到了這兒。回到家，他給自己造了一間有異域風情的書房，寫作歷史演義，包括彪炳史冊的賓虛。他的出現有助於激發當地作家，如莫里斯·湯普森（Maurice Thompson）等人，他們捍衛了這座小鎮“印第安納之雅典”的美名。像瑪麗·漢娜·

克蘭特 (Mary Hannah Krant)，以本·歐菲爾德 (Benn Offield) 為筆名，1876 年 8 月 5 日在當地報紙上以激昂而不煽動的口吻發表文章說，“克勞福茲維爾，眾所周知，是文學的……克勞福茲維爾的市民對他們的小城滿懷敬意，他們驚訝地發現它與整個世界都不一樣”。

儘管有著如此光明的氣息，這座新雅典，仍同老雅典一樣，有著黑暗的角落。儘管教堂在克勞福茲維爾遍地可見，卻沒能勝過酒吧——北綠街的一個街區就曾有 23 家。與之相伴隨的是性交易的興旺發達，使報紙上充斥著義憤填膺的社論。鎮上有個地方叫菲斯克維爾，是出名的紅燈區，那附近的一座公立學校，菲斯克維爾學校（又叫維特洛克學校），因為缺少生源，本世紀初就早早關閉了。妓女們非婚生的孩子是用不著上學的。

溫德自己對這座鎮子的記憶點染著樹林和性。克勞福茲樹林很普通，樹木不過一叢。但溫德年老時，仍彷彿看見，自己一有機會離開家，“就過街鑽進克勞福茲樹林，漫步其中，爬樹的能力無人能比”。

他可以爬上“較低的部分好比踩樓梯，從枝樞爬上樹頂。從那兒我可以看見世界”。他以生命最後幾年半睡半醒的那種狀態補充道，從那兒，“我遇到了最奇妙的東西，除我之外無人能爬”。城裡沾滿了性，他說，此事在他的腦海中又和樹木攬在了一起。“一株櫻桃樹長在我家後門外”，他曾告訴我。“你知道我是怎麼認識到性的嗎？爬那棵樹的唯一方法就是手腳並用抱住枝樞，我就撐在那兒，在喘息著滑下去之前，因興奮而戰慄。我從那樹上認識到了性。”^①

他還或實或虛地記得，移民女子被帶到城裡當僕人，有時被迫提供性服務。克勞福茲的整片樹林，他說，“滿是矮樹的遮蔽，每棵樹蔭下都有個女人，整日賺取生計”。而他可以棲息在樹裡，高高在上，向下俯視。

街上的窯子，妓院，堂而皇之，給這個男孩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男人

^① 溫德，訪談，1985 年 3 月 27 日。

用女人來解決慾望，“法律無法禁止”。他依稀記得，那些日子裡，“有些地方可以從另一些地方借姑娘，住在他們的房子裡為他們幹活。從外借來的姑娘屋裡傳出叫聲——法律無法禁止——他們還把這些姑娘拴在一個房子裡”。他想想又說：“你知道，這令人驚訝，像我活了這麼久，就知道這個世界已經好多了。(原來的)人幹的那些事在今天是要被槍斃的。”這是唯一一次我聽他論辯道德進步。

溫德的母親“非常喜歡園藝，總是在花園裡種花”。^①每個週日早晨，他都和她在花園裡，他說，有時一個很漂亮的鄰家女人會經過，拐角去雜貨店，儘管雜貨店星期天不開門。當她走過來，就會向正在和兒子一起種花的溫德母親大喊：“我去雜貨店付賬單。”溫德解釋說，那意味著，“她去雜貨店，那兒週日關門。我不知道雜貨店有沒有一兩個人。我想那兒有兩兄弟，那一整天他們無非輪流上她”。“整個鎮子就是沾滿了性，但卻死不承認，”他告訴我。週日“有大笑聲，小的四輪馬車經過我家，滿載歇業一天遊逛的妓女。每個人都知道那是甚麼，每個經過她們的人都會笑著揮手，他們看不到有甚麼妨害。只有我可以爬上樹”^②。

在這個無人談論性，卻充斥著性的鎮子裡，從樹上俯瞰露天的窯子，移民女子在那兒靠著樹，把自己交給粗野的客人，在交錯的光影裡——真是一幅說來奇特的美國式圖像。其中一些無疑是回憶時的想像，或者是他年老之後因意識混亂而添油加醋。但這就是他的記憶，持續到他高中，我都記了下來。

溫德高中的班級冊記載，他“油頭粉面打扮時髦”，班裡一個機靈人用一個對句來論定他：

① 溫德，訪談，1985年3月27日。

② 同上。

一個漂亮博士的人生他將過著，一切時尚專欄他讀著。——一則
胡說八道的預言

溫德在離開高中之前，發現了通往其他世界的窗子，不僅在書中，也在外國語言裡。他十來歲時，隔壁鄰居從歐洲娶回一個法國妻子，她學英語毫不困難。她常邀溫德過來，給他東西吃。這樣她能和他談話。當她丈夫突然去世之後，這個男孩成為這個女人唯一的真正夥伴。因此，到他進入家鄉克勞福茲維爾的沃巴什學院——那是 1905 年——溫德不僅掌握了他在高中學的拉丁語和希臘語，還像英語一樣精通法語。^①

溫德 1905 年從高中畢業時，是一個大耳朵男孩，比同班同學看起來年輕一些。他的臉明亮，透著光，滿是期待，不像同班的男同學，他們或多或少像是長著雄性下巴的霍瑞修·愛爾傑 (Horatio Alger)^② 式美國夢。他們似乎隨時準備投身宜人的職位。對僱主來說，聘請溫德是冒險。他看上去過於敏感，儘管他看你時的目光是坦率的，但臉上卻覆蓋著隱秘。

幸福的是，他不求職，而是開始了學術生涯，獲得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大二那年，以及次年，都在學院當教員——先是希臘語（取代埃茲拉·龐德的位置），然後是法語。大二春季學期末，他在學院排演的《俄狄浦斯王》^③ 中扮演了宙斯的一個祭司。他的詩和散文發表在學院的文學刊物上。他有一首具有彌爾頓風格的四行詩《潘神崇拜》，讓它的讀者，從“欣悅的知更鳥柔亮合鳴，翱翔的雲雀高奏甜蜜之歌”，到“倦於探索模糊

① 溫德，訪談，1984 年 12 月 12 日。

② 霍瑞修·愛爾傑 (1832—1899)，美國作家，盛產少年小說。他被視作美國夢的化身，原文為“Horatio Algerism”，意為穿戴整齊，努力工作，物質生活豐裕，人際交往順利的成功人士。——譯者註

③ *The Wabash*, XXX. 13 (1910 年 5 月 21 日)，“希臘劇《俄狄浦斯王》”，1908 年 6 月 16 日沃巴什學院學生在希臘語系的資助下以英語表演。

的神靈，來崇拜潘神；春天不會停留很久”。在另一首詩裡，有個片段用斯賓塞詩體寫成，叫“阿波羅與達芙妮”，舞台為林中仙女倏忽即逝的狂喜而設，儘管這一幕沒有出現。^①

最後一學年，溫德擔任了沃巴什雜誌《大學委員會》(The College Board) 的文學編輯。在沃巴什的最後一個學期，他寫了一篇有關薩克雷的文章，結尾激情洋溢地捍衛了那顆智慧之心：

在科學方法盛行的時代，舊式方法的擁戴者幾乎都害怕那種藝術會滅絕；手段變成了目標，小說近乎解析人類的科學論文。但這些最終會導向窮途末路。知識是必需的，但它必須居於次要地位；藝術家的作用是看見和感受；不遺漏他留意的最輕微的光影或線條，而且呈現給我們，讓我們以他的眼睛看，以他的心靈感受，而不僅僅以他的意識去認知。^②

在沃巴什，溫德學會將他那標誌性的古怪轉換成優勢。大家都叫他“博比”(Bobbie)，畢業那年，他獲得創作“班詩”(class poem)的榮譽，入選美國大學優秀生全國性榮譽組織(Phi Beta Kappa)，還獲得福勒·杜姆(Fowler Duhme)英語獎學金。他還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校級獎學金。沃巴什一家報紙在報道這一殊榮時，稱讚他“作為一個天生的文學奇才”，還“在這裡修習了所有的英語課程，異乎尋常地勝任獎學金所給予他的工作”^③無疑，他的確如此，但或許因為承擔不起紐約的學習費用，他仍留在沃巴什，短短一年內拿到了學院頒發的文學碩士學位，又

① *The Wabash*, XXX. 13 (1910年5月21日)。

② 同上。

③ 《沃巴什學士》(Wabash College Bachelor)，1910年5月21日，第2頁。

過了一年，他再次回到學院，擔任該校教員。

但溫德在沃巴什最重要的經歷，來自那位年輕的、才華橫溢的羅曼語教師給他的深遠影響，即任教短短數月便被學院解聘的埃茲拉·龐德。遇見龐德，是繪製以及推動溫德人生進程的一系列邂逅之一。雖然他們之間的接觸很短暫，但兩人後來還是保持了一年的通信，溫德告訴我，主要是談文學分期的觀念。“我們本只是短暫的謀面，整件事卻對我的人生非常重要，”溫德說。^①

兩個年輕人（龐德只比溫德大兩歲）最後一次見面，是在龐德離開沃巴什的前夜，這讓溫德第一次瞥見放逐的欣快。溫德還記得那一幕，不轟轟烈烈，但歡樂的程度甚至勝過龐德自己那段著名的敘述——他曾收留了一個被巡演馬戲團遺棄的姑娘。龐德那時住在格蘭特大道的一套公寓裡，“沒有成家的教師常被安排到那兒住”。時隔七十五年，溫德還記得，克勞福茲維爾，“是一個不太開化的村莊”。

學院裡某個狂熱的清教徒去看龐德，發現當地一個女教師在他房間裡問他一些關於語音學的問題。他立即跑回沃巴什總部，命令他們向龐德發一封官方信函，要求龐德乘下一班火車離開鎮子！幾小時後，我正巧去看龐德，他把那封信給我看，又挑出一堆勃朗寧的詩，對我讀起《當代人所見》，開頭是“我此生只認識一個詩人”，接著又說一個男人如何注視“瓦拉多利德街上的一位男子”，並來回走動，觀察記錄一切，當然，這是個詩人，卻被當做間諜！然後，龐德道別，離開克勞福茲維爾，去意大利。我們的通信大概持續一年。他在一封信裡說我是克勞福茲維爾最文明的人。後來他遇到了 T.S. 艾略特，並激勵後者去當一個好詩人。和龐德在一起的最後那晚，我才被

^① 溫德，訪談，1985年3月3日。

驚醒！！！沒有龐德，我現在可能還是一個爬行在克勞福茲維爾的白癡。而現在我是一個在中國的好鬥的不可知論者！^①

龐德誇獎溫德是“克勞福茲維爾最文明的人”，可能不盡切實，但把他和一個被當作間諜的詩人聯繫在一起，龐德可謂驚人地預見到了溫德在太平洋兩岸的事跡——一種錯覺，卻也有某種準確性。溫德，像勃朗寧筆下的詩人那樣，總在觀察，常常記錄，以令人不安的銳眼，恰如勃朗寧的詩人，他在某種意義上，為上帝充當間諜。

龐德給溫德的瞬間饋贈還有更大的用處。1908年2月15日的《克勞福茲維爾雜誌》提到了龐德的離開，並說海恩斯教授將接過他的法文課，而羅伯特·溫德將替海恩斯上一個班的希臘語課。因此，正是通過龐德，溫德接到了他的第一份教學任務。

雖然這些證明了他的早熟，溫德卻從沃巴什同學那裡獲得了他未能在高中獲得的認同。學院年鑑上，他照片下的解說是：“一個偉大的人，但和光同塵，從不以此自矜”——一種東方判語式的奇怪預見，日後被溫德用來估量自己。

1909—1910年，溫德一邊攻讀文學碩士學位，一邊在英語系教書。他所得到的認同和鼓勵不僅來自沃巴什，也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即便後者這份他沒用上，但也使這位年輕人考慮開展自己的學術生涯。但他躁動不安，在完成了那一年的教學和碩士學習後，他走出了母親的房子，沒買票就上了一班火車，抵達紐約，很快又預訂了去英國的行程（至少，聯邦調查局從洛克菲勒基金會那裡獲得的年表是這麼記載的）。

溫德不是很喜歡英國；它太像美國了。因此他接著去了巴黎，在索邦

① 1982年1月9日，溫德與王汝杰談。RAC Special Collection: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大學報了個班，住在一个“根本不適合人住”的房間裡。在巴黎，他結識了藝術圈，還可能認識了維克多·塞爾吉^①。他在法國獲得的幾十份工作邀請全是要他往重要人物或重要建築上投炸彈（都被他拒絕）。^②這可能是他與恐怖主義的第二次相遇，卻應該不是最後一次。

1911—1912年，他在那不勒斯大學學習。然後他啟程回家。但是，他告訴我，當他“一走進美國”，他就感到自己犯了個錯誤。“從那時起我這一生都覺得美國住起來糟透了”。他說，無論他甚麼時候回來，他的腳一觸到故國的土地就只想趕緊轉身而去。

可是，從1912年算起，溫德在美國又待了十多年才徹底離開。此間第一年，他在“經營”。然後，從1914至1916年，他成為印第安納州豪威軍事學院羅曼語系的主任。接下來的三年，他在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的市立高中教法語和西班牙語，他在那兒還擔任校刊《埃文斯頓人》的諮詢委員，擔任法語俱樂部的指導老師，在法語喜劇《羅莎莉》中領銜演出。他還給出了大量的戲劇讀物，包括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阿里安娜與藍鬍子》，它很能引起女性讀者的興趣，她們發現阿里安娜這個人物是“現代女性，探究並苛求理性”，而其他女性角色是“中世紀典型的順從女性，她們本能地、毫不遲疑地服從”^③。

對埃文斯頓學法語的學生來說，溫德是一道強光，他們不僅激情滿懷地記錄下他的所讀所譯，還感謝他為他們打下了真正欣賞法語文學的基礎。^④他似乎很享受在埃文斯頓的自在生活。溫德後來在中國的一位同事的妻子多蘿西·蓋洛德（Dorothy Gaylord），還記得他的話，“書生意氣，一

① 維克多·塞爾吉（Victor Serge），法國革命者。——譯者註

② 溫德，訪談，1984年12月12日。

③ 《埃文斯頓人》1919年10月1日第3期。

④ 同上。

路從密歇根大街東頭漫步到西頭”。^①

溫德在市立高中期間，1918 年大流感令兩千萬人喪生，他也染上了感冒。一天，當他回到租住的房間，剛進門就失去了知覺。他的女房東試著找個醫生，但她聯繫的每個人都得了感冒進了醫院，於是找到溫德認識的一位女老師，她過來，在醫院的指導下護理他。經過三天的昏迷，溫德康復了，但右支氣管上留下了一道疤，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近六十年後，他仍將暮年時期在北京大學每到冬天就頻頻感冒歸咎於這場病。)

1919 年 12 月《埃文斯頓人》刊載了一篇關於“山東問題”的評論，^②署的是個學生的名字，“凱瑟琳 · F. 布拉默”，但文風和思想卻酷似溫德，他是這份刊物的指導教師之一，已經開始培養學生對中國事物的活躍興趣，並施以援手。這篇文章引人注目地涉及中國歷史的一個階段，它後來被證明是中國開始漫長奮鬥邁向現代認同的關鍵一環。

這件事的要旨在於，中國在一戰中加入協約國，協約國戰後對中國的回報卻是攫取山東，它戰前是德國的“勢力範圍”，此時卻被轉給日本，而非如中國所願物歸其主。在各國首腦會議上，有人提出了這個方案，美國反對這一結果，但勢單力薄。中國青年對協約國這一決策的反應是“國恥”。1919 年 5 月 4 日，3000 位學生群情激憤聚集在北京大學，並遊行入城，攻擊、火燒中國外交部官員曹汝霖^③的宅第，學生們認為曹汝霖應該對山東問題負主要責任。曹汝霖不在家，學生們找到了駐日公使章宗祥，將他打得不省人事。

這一事件直接導致的後果是 32 位學生被捕，其中一人三天後傷重不治。長遠後果是，這一事件，達到了五四運動（運動以此日期命名）的高

① 電話訪談，1986 年 11 月 13 日。

②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③ 曹汝霖當時任國民政府交通總長。——譯者註

潮，成了中國現代民族運動的著名開端。

這一事件因其複雜性，在埃文斯頓引人關注，事件爆發之後沒幾個月便最終轉變了現代中國的面貌。一個年輕的美國高中生，在學校導師的幫助下，在《埃文斯頓人》上發文，為山東的歸屬權辯護，說“作為共和國的中國需要一個偉大的統一國家。如果山東歸還中國，卻沒有中國自己的積極行動，那麼能否取得統一是令人懷疑的。問題在於：將是中國來設法自救，還是其他國家介入，替她決定自己的命運？”^① 羅伯特·溫德不會知道，這個問題不僅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也決定了他自己的命運。

然而，不知不覺中，他邁向了他的命運。1918年秋天，他在西北大學兼職擔任法語助教，這樣每月可以多收入50美元。^② 這份工作只持續了整個秋季學期，但到1920年他得到了芝加哥大學的一份全職工作，這工作頂著羅曼語系助理教授的名頭——他教的卻是大學的初級學院，他給之前只學過一點兒甚至完全沒有基礎的學生教法語和西班牙語。^③ 這麼卑微的地位不會讓溫德開心。陷入學術的末路，他不會知道自己即將踏進一段塑造他人生最終形態的冒險。

在芝加哥，恰似在克勞福茲維爾，溫德最重要的經歷就是他遇見了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留學的傑出青年詩人聞一多。聞一多的第二部作品《紅燭》剛在中國出版，這奠定了他作為中國首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現代主義詩人的地位，後來，他因為政治原因於1928年放棄詩歌創作，成為一位卓越

①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② Memo, Patrick Quinn, Northwest University Archivist, to William Padden, April 23, 1985,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③ Memo, Daniel Meyer,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Peter Dembowski, Department of French, April 3, 1985,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的文史學者，白英^①說他“也許是最偉大最有代表性的，也肯定是在現代中國最受愛戴的”。^②

聞一多，24 歲，而溫德比他大 11 歲，通過兩人都認識的幾個畫家而邂逅。溫德請聞一多吃了幾次飯。有一次，詩人尤妮斯·蒂金斯（Eunice Tijetjens）及其夫君克洛伊德·海德（Cloyd Head）加入了他們。尤妮斯剛從中國回來，發表了一本以中國傳統詩歌形式寫成的詩集。他們的談話大多聚焦於中國詩歌技巧。但溫德印象最深的是：

（來藝術學院）之前有天發生的事令聞一多激憤不已。他正畫著素描，中途停下來思索這幅作品。一些美國學生經過時，不經過允許，就拿起了他的素描，看了一會兒，然後一言不發地扔在地上走了……如果他們告訴聞一多，他的素描很糟，他也許不會生氣，但他們把它扔在地上而不是放在桌上，他只能把這解讀為一種故意的侮辱。^③

聞一多和溫德發現，儘管他們很不相同，卻擁有一個共同的世界——繪畫、詩歌和民主理想的世界。他倆一起出入於藝術學院。詩歌方面，聞一多激賞約翰·濟慈的詩。濟慈是聞一多的詩歌導師，也影響了溫德早年的詩作。圍繞這一旨趣的交匯，他們的友誼綻放為事業關係。溫德翻譯了這位年輕中國詩人寫於芝加哥的詩歌新作，即後來出現在聞一多第二部作品《紅燭》中的一些詩作。溫德還要聞一多和他一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

① 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美籍英裔作家。

② 羅伯特·溫德引用，溫德日記（二），第 39 頁。我最初看到的日記是兩卷本，是溫德至死還隨身帶著的。洛克菲勒中心檔案館還有個一卷本。因為兩版之間有輕微的出入，我主要參考兩卷本，除非有些材料僅見於一卷本。據英文原文，以下此書註釋中的 D、D2 皆指稱溫德日記、溫德日記（二），不另註明。

③ 羅伯特·溫德引用，D2，第 40 頁。

兩人的友誼不純是美學上的。他們共享了對自由民主原則的強烈忠誠，對壓迫的憎恨。聞一多去過美國的唐人街，了解美國體制中的種族主義。他一生都盼望中華民族能夠自立，與對手平起平坐。他夢想所有民族之間都有這種平等，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他看到自己的國家要獲取西方先進技術和科學卻被民族主義所阻礙。溫德強烈反對種族主義，他注意到大學讓他壓低黑人和猶太學生的分數，他既對受壓迫的東方學生深懷同情，也景仰東方民族的古老文化。恰如他後來所說，他已經明白自己有志於溝通東西方文化，並為民族平等事業而奮鬥。

溫德與聞一多之間的友誼因而建立在共同的趣味和理想上，儘管如聞一多自己承認的，他通常“並不善於社交”。後來，兩人都看到他們的烏托邦夢想變成了夢魘。但在芝加哥，在 20 世紀初，他們依舊談論著夢想。溫德還記得：“我告訴他，我夢想一個世界——我描述了這個世界的樣子。他說，‘如果這就是你想要的，你應該去中國。’於是我就馬上坐船去了中國。”^①

聞一多自己對於這段短暫而強烈的友誼的印象，呈現於 1922 年 11 月末給梁實秋的一封信中，梁當時還在中國，打算稍後去美國找聞一多。聞一多寫道，他發現溫德“真的是一個有趣的人，……是對中國極友善的美國人之一”。溫德的性格，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故事來描述”。溫德有一個非常大的中國鐵磬：

只要他睡不著，他就會把它帶上床，聽它敲擊時發出的聲音。他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一旦他發現有女孩愛上了他，就會離她遠一點。我想那肯定是他年輕某次愛戀失敗的結果。我這樣想是因為當我要看他的詩時，他說自己少年時期非常浪漫，但有天他毀掉了自己所有的

^① 溫德，訪談，1985 年 3 月 3 日。

創作，從此不再寫詩。不過，他還是很愛詩，我還有他翻譯的全部波德萊爾。

聞一多說，不論何時拜訪他，他們都會“談到夜裡一兩點，直到我對他說再見，去另一個房間拿外套。在那兒，我們又開始另一場談話。當我們一起往門邊走，我們繼續談。我們開門，我們接著談。我走到台階，我們還在談。最後，我不得不說，‘我要上床睡覺。’我們終於找到時機互道‘晚安’然後分手”。

這段友誼開始的時候，溫德已經是一個親華者。聞一多第一次去他家時，溫德提著燈，照著牆上一幅畫，讓他猜上面的人是誰。聞一多正確地答出了“老子”，並且驚異於這幅作品的品質，因為它的創作者竟從未學過繪畫。溫德還摹過幾個很大的印度佛教人物像，聞一多愉快地注意到，溫德的東西來自中國、印度和日本。聞一多拜訪的時候，溫德還焚過東方的香。^①

聞一多之所以長篇敘述這位新美國朋友，有他的意圖。溫德告訴他，自己不會再待在美國，想去中國。11月中旬，在聞一多給梁實秋寫信的前幾週，聞的朋友張景鉞（他那時正跟著溫德學法語）和聞一多共同致函清華大學（當時正由留美預備學校重組）曹校長。此時聞給梁實秋寫信，希望曹校長能促成溫德被選聘：“如果你發現了‘推送’的辦法，那對清華大學來說是意義重大的。我從沒見過這樣的美國人。”

如同聞一多向梁實秋指出的，“最重要的是（溫德）說他不能再待在美國，想去中國”，溫德肯定醉心於聞一多所描繪的五四運動之後中國釋放出新的政治、思想之發酵，正如他抵制美國的貪婪和種族主義。離開

^① 聞一多致梁實秋，1922年11月26日，《聞一多全集》第三冊，香港：三聯書店，第608頁。

前的幾個月，溫德說，系領導要他壓低班上猶太和黑人學生的試卷分數，免得大學被他們大量佔據。

但也有可能是溫德遇到了某種麻煩。聞一多說“他不能再待在美國”暗示著一種真正的緊迫，可能涉及同性戀問題。難解之處在於，聞一多從沒告訴溫德自己往中國寫信的事，大概他寧願先等，直至接到回覆。但溫德似乎性急地預訂了去中國的行程。在聞一多為了他而寫信的前幾個月，他申請了“通行證，去日本和中國，以旅行和研究目的，預計逗留 12 個月”。1923 年 7 月 27 日簽證發下來。1923 年 8 月 21 日，他離開了美國，從舊金山登上“東京丸”輪。

第十九章 再見，溫德

本書開始於 1984 年 9 月中旬我第一次拜訪溫德。我和家人當時剛到中國，我將在北大教一年課。王汝杰陪我去溫德家，結果在溫德家門口碰到他父親王岷源。王岷源走過來，衝我們搖搖頭。屋子裡有人在咆哮，王汝杰進門查看情況，幾分鐘之後示意我們可以進去了。只見溫德龐大的軀體躺在一個小床上，靠著枕頭，正朝傭人大叫，說她要害他性命。他絕望地說，如果我們是他的真朋友，那麼最好動作快一點。

等溫德略微鎮靜，王汝杰幫他坐到輪椅裡，我們一起到了他的小院子裡，園圃久未打理，日近黃昏，日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我問溫德，有甚麼可以為他做的。他回答說沒有：以他現在的情況，我唯一能幫到他的，就是帶他離開這裡。以我當時的理解，溫德是說兩年前一次自行車事故後，九十七歲的他無法下地走路了。我當時哪能知道，“現在的情況”指涉的是如煉獄般的自我懷疑。

外頭變冷了，我們進屋。王汝杰扶溫德上床，我則環視了一下室內。屋裡堆滿了東西，近乎臟亂，有一股藥味和人的體味直鑽鼻子。但各種稀奇別致的物件散落於各處，如同煊赫過去留下的遺跡。^①

溫德馬上講起了 1921 年他是如何離開美國的往事，思路清晰，口吻不容置疑。他開始講的時候，用的是不怎麼流利的中文，後來想起我在現場，便開始用英語講。他說分析過自己為甚麼來中國，原因在於美國式的宗教信仰有問題。所謂有問題，並不是說美國人過於自詡有宗教信仰，

① 對此，引言部分有更詳細介紹。

而在於很多人根本沒甚麼宗教信仰，只是天天談論它。而中國人實際上是有信仰的，他們只是不放在嘴上說而已。溫德在盛年時也許很少會自我懷疑，而如今他說希望將自己輕輕抹去。他的自我曾經無比引人注目，這種轉變算不算是佛家裡的頓悟？

溫德非常想知道，為甚麼大家現在會來看望他？他的生活可曾有一些意義？他告訴我，有個來看望他的人，說他是好人。溫德問他，是誰告訴你我是好人的。對方語塞，只是以溫德沒有做壞事的能力勉強作答。“這個答案我是不滿意的”，可能是想起了以前的恣意生活，溫德搖了搖頭。不過聽到王岷源說，那個人對他評價極高，溫德還是很高興，也深感寬慰。

但他還是心存疑慮。我為甚麼來看望他？我對他了解多少？我告訴溫德，王岷源之子曾在我所任教的沃巴什學院讀書，而我久仰他這位桃李滿天下的大學者。溫德面露微笑。王岷源在旁又補充說有多少多少知名作家、學者都曾經受溫德影響，這位九旬老人的笑容也多了。但是，溫德的自我懷疑深不見底，再多的讚揚都難將它化解。

在與溫德第一次見面時，他的回憶中似乎有著揮之不去的幻覺。我有時候很難區分何為回憶，何為幻覺。“列根訪華時曾來過，依中國禮節，向我鞠躬，卻未發一言。這是甚麼意思？”問題太突然，容不得我不回答，便只得告訴他，這說明美國向他表示敬意。

有一些故事則是真實發生過的。解放前，外文系 46 級的傅一因追求進步被列入黑名單，正遭國民黨搜查。經進步教授張奚若的女兒張文英介紹躲在溫德家中。“八·一九”當日^①，有幾個人來敲門，溫德能看到來人穿的都是上好的皮鞋，斷定他們是國民黨特務。於是趕緊把她藏在臥室裡的一個大衣櫃裡並上了鎖。特務進屋要他開鎖時，他推說鑰匙丢了，這樣

① 1948 年 8 月 19 日，國民黨軍警衝進清華園內大肆搜捕進步學生，這就是著名的“八·一九”事件。事後梅貽琦校長曾憤慨地說：“軍警上高等學府裡面來抓人，這是清華建校以來首次。”——譯者註

躲過了軍警特務的搜查。

溫德滿心歡喜地回憶起他的園藝生涯。有一次他說自己整天在想雜交花。他從德國買了一些金盞花，經由西伯利亞運到中國（此事可能在五十年到六十年前），將它們與中國的菊花雜交，結果開出各種顏色的花朵。他的廚子看出來溫德極珍視這些花，便將其連根挖起賣與鄰家主婦，放在盆裡養。“放在花盆裡養不活，都枯死了。”他只好重起爐灶，但再也未能雜交出第一次的變種。如今的園子裡花花草草仍舊不少，包括幾叢很平常的金盞花。園子已經好久沒打理，大概從他兩年前臥床開始，花草就只能自生自滅了。

告別時，我們握了握手，溫德請我以後再來看看他。當時，我就下定了決心，或者說已經被他“施了法”。我很想為他做點事，能做的恐怕只有將他的故事講給世人聽。我在出門的那一瞬，又轉過身，看到他倚靠在一張小床上，憔悴虛弱，連連咳嗽，幾乎不能動彈。他就像一條擋淺在岸邊的大魚，呼吸著最後的幾口氣。

幾週後，我又騎車到溫德家。他還是糾結於自己算不算好人，並悲傷地給自己下定論：他做的每樣事情都是得到別人讚許，而非為人世間做一些貢獻（溫德這席話，讓我重新思考起他的自我懷疑。對自我的懷疑是不是一直縛繞在他心頭？他做甚麼事，首先考慮的總是向別人證明自己，證明他自己是個好人）？他現在覺得自己這一輩子吃的苦頭，是為同性戀身份而遭到的報應。他覺得服侍他的王老太也遭到了報應，因為她以前做妓女，“每天都要接客”。三十年前，溫德在半路上看到一夥人在打一個妓女，就把她救下來了，與之生活在一起。王老太經常受氣。住在溫德隔壁的蔡斯特（Zeisberger）教授告訴我，有一次溫德在院子裡追王老太，把自己摔得不輕。^① 溫德好像總是怒氣一點就着，在神志不太清楚的時候就更是

① 有人則說是因為追罵他的廚子。

容易暴跳如雷。

我該告辭了，鎮靜下來的溫德問我這一趟來看他值不值得。我發自肺腑地請他放心，他聽到這些話後破顏而笑。能給他帶來寬慰，念及於此，我心裡暖乎乎的。寫這部溫德傳時，我經常想要圍繞著最後的蓋棺定論來構思全書，就好像有可能對曾經活生生的這個人做蓋棺定論一樣。溫德有一次問我，我會寫他的好還是寫他的壞，我說會寫他的好，他這樣回道：“那樣就不是真人真事了。”他懊惱自己給我講的事情有時七零八落，“我的頭腦已經碎了一地”。

他常常把一些記憶碎片說給我聽。比如，他談到基本英語計劃：“有一天整個世界會操同一種語言”，這是瑞恰慈的夢想。瑞恰慈“是我一輩子認識的人當中最偉大的一位”。瑞恰慈相信，總有一天，想像力會東山再起，與理性並峙，正如威廉·布萊克所構想的那樣，而只有中西方心靈更深入地交流才能將它實現。瑞恰慈像 19 世紀的浪漫主義者一樣，害怕分析理性最終會扼殺想像力，溫德哀歎這一天已經到來：“人們太忙了，忙得丟掉了前人留下的珍寶。”而我用龐德的詩句“你最愛的必將留下”來安慰他，溫德會心地笑了。

生命臨近終點時，他被困在身體的囹圄裡，猶如受刑：“不能走路後，我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以前能走，我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一邊走一邊看。現在我哪兒都去不了，甚麼也看不到。走不了路實在太可憐。”他特別懷念附近的“荷花池、水中浮游、花鳥和翠竹”。這些曾經散過的步有時與童年記憶混淆在一起。他回憶自己兒時在湖邊散步，看到古文明的遺跡，僅留下殘垣斷壁。我想他可能說的是圓明園。我們夫婦曾帶著五歲的女兒去過，女兒把那裡當成遊樂園，溫德說自己“在那裡爬上爬下，開心至極”。

溫德也經常回憶起哪些人對自己很好。著名翻譯家戴乃迭 (Gladys Yang) 邀請他去家裡吃飯，也經常來登門拜訪。溫德 1940 年代在美國淹留期間，有位女士問他為甚麼要回中國，溫德回答說他想讓這個世界變成

更好的地方。她又問溫德如何打發空閒時間，溫德說自己每天讀書。“你讀多少書？”“一天一本。”等溫德回到昆明，他收到一封電報，上寫“一天一本”。從此，她真的每天寄來一本書！溫德經常說自己不喜歡女人——可能是因為幼時生活在一屋子女人中間所致。“我的因果報應就是被困在這裡，由一個女人掌握生殺予奪之權。”這是他經常的論調，就好像這間屋子是他的囚室，同性戀便是他的罪孽。更有甚者，這是一間幾乎沒有窗戶的囚室。一天二十四小時，他只能這麼躺著，“盯著電視或者不拘哪裡有光的地方看。我已經時日無多”。

我手頭拮据，只能請得起一個傭人，就是給你開門的那個。她命途坎坷，我救她的時候，她幾乎都算不得一個人。像她這樣的女人，在社會上無地位可講，經常就這麼白白被打死，殺人者不用償命。這在全世界幾乎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可能的。是我把她帶回家，叫她的名字，我能肯定她自己都記不得之前發生了甚麼……

溫德碰到她的時候，一群人正圍著她，用棍棒石頭毆打她。溫德舉起自己用來“擺譜”的手杖，把這些人趕跑了，否則這個女人極有可能就被打死了。救下了女人的溫德，覺得自己對她從此負有某種義務。這個事件是在哪一年，溫德沒說，但很有可能發生在他開始自我認同為社會邊緣人的那個時期。

李賦寧教授在去世前曾對我說過一番話，這番話也許能減輕溫德的自我懷疑。李賦寧曾是溫德的學生，1946年在溫德的幫助下赴耶魯大學留學。他說：

溫德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把這一形象刻畫出來，並且突出他為中國教育事業尤其是培養外語教師而做出的貢獻，以及他反

法西斯、擁護共產黨的先進事跡。這些方面都值得我們致以最高敬意。

* * *

1985年7月19日，再過四天我就要飛回美國了。我們一家三口吃早飯的時候，溫德的廚子梁師傅過來邀請我去吃午飯。我便與他一同騎車前往。我倆蹬得飛快，因為天上馬上要下雨了，梁師傅一路按鈴，帶著我從如織的行人間飛馳而過。天上竟然下起了太陽雨，強烈的陽光從茂密的樹間直泄而下，照到溫德家附近的荷花池的時候，荷花反射著光，幾近半透明。

王阿姨已經站在門口等我們了，笑意盈盈。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坐在屋外，在我走過時也衝我笑，就像艾略特四行詩裡的那位似有深意的不祥之人。隨後他竟然倏忽而去了。溫德坐在一張椅子裡打瞌睡。椅子的後背是用塑料線穿住的。他前面放著吃了半罐的酸奶，還有兩包巧克力餅乾。梁師傅把他叫醒，告訴他我是來道別的。

溫德看了一會兒梁師傅，兩眼迷離，然後開始呵道：“我告訴他們把我的名字去掉。我來這裡，從來就與政治無關。現在麻煩來了。我想讓自己小到不被人注意。但變小以後，我就甚麼也不是了。”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眼睛盯著一幅卷軸，上面有毛澤東的四字名言：“百花齊放。”

然後陷入長長的沉默，又開始說道：

隔離審查的時候，一共五個被審犯，其他四個緊張得不得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們開始審我，我用法語說“一個年輕人從耶路撒冷去往傑里科，路遇劫匪，被棄於道。但他大難不死”。我甚麼也不想說，卻又說了一大堆。說了一大堆，因為他們是劫匪，而年輕人操一種他們聽不懂的話，講的是他們不知道的聖經故事。

突然，溫德又想到了王阿姨。竹影在窗外的陽光裡婆娑，但他指向竹

影說，“她在那邊開過妓院……誰心裡有壞水，她一眼就能看出來。她給中國最壞心眼的人做幫手。”為了弄明白他在講甚麼，我追問：“她給哪些人做幫手？”“主要是那些想從中牟利的大組織，還有一些單幹的壞人。無人能逃過她的手心。可以和哪些人合伙幹，可以為哪些人效勞，她心裡一清二楚，至於他們為甚麼那麼幹，她不甚了解。中國人很奇怪，他們也不說自己幫誰做事，但他們總是在辛苦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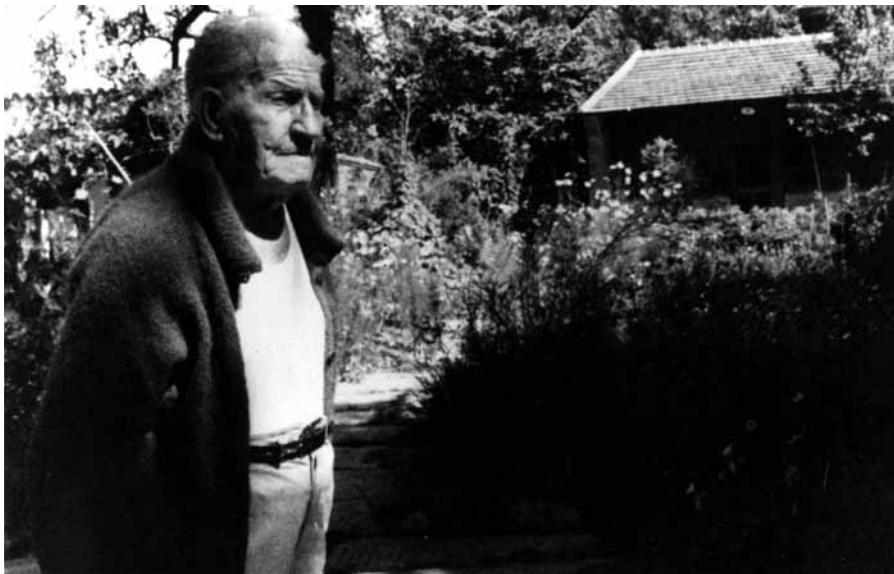
我深知，這些荒唐言藏著溫德辛酸的過去，非我有限的知識和經歷所能理解，但我已習慣於此。在中國待得越久，中國反而越神秘，越讓人難以參透，我彷彿經受了一次緩慢而漸次加深的文化震撼。神志不清的老溫德正是這其中的一部分。

我一邊和溫德聊天，一邊吃端到面前來的豐盛午飯。有道菜是鴨肉（當時在北京很貴），用茄子做配菜。還有一個青椒、黃瓜和西紅柿做的沙拉。王阿姨又端進來一碗番茄湯，油光蹭亮，但非常美味。飯後水果是三大塊西瓜，和梨罐頭。這不是一頓中餐，而是一頓西餐，我用的是刀叉。溫德一口未進。對於溫德，我心裡還是重重謎團，這將是我和他的最後一次談話，我多麼希望他能從病牀上下來，再度回到健步如飛、思維清晰的六十歲。

王阿姨不時打斷我的沉思，讓我“快吃，快吃”。我已經吃撐了，她就像我的猶太老鄉那樣直說“不好，飯菜不好，你肯定不愛吃”。我向她保證飯菜非常可口，她就又開始催促“多吃點，多吃點”，我甚至擔心她會親自把飯菜餵到我嘴裡。

飯後，我和溫德又能開始交談。這期間，王阿姨兩次過來給他送人參蜂王漿，我告訴他這是好藥，口感甜又能長力氣。她把人參蜂王漿的小蓋啟開，倒進調羹，餵到溫德口裡。

“你想要寫一本關於中美心靈的書，促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中美人民會相互理解的，不管有沒有這樣一本書幫忙。”



溫德在北大朗潤園

於是又回到那個反覆出現的話題。

“中國人怎麼看我？”他希望我問問王阿姨。接下來的一幕變得有些超現實。“讓他來翻譯”，溫德指著一邊安安靜靜坐著的梁師傅。梁師傅不會英語呀！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溫德每一煩擾，梁師傅就柔聲跟他說話，握住溫德的手，用另一隻手輕撫他的背。王阿姨在另一個房間吃完飯之後，又走了進來。溫德用中文問她這個問題。王阿姨回答後，溫德給我翻譯。我們的對話那麼不動聲色，就好像不是在演一齣荒誕劇。

“傅一、毛澤東、周恩來都說你是好人。”

“這只不過都是些人名”，溫德不以為然。

我說，“不對。他們為你對中國的貢獻而敬仰你、感激你。”他笑了。

“你為甚麼懷疑自己？”他的眼睛濕潤了。王阿姨又說了一句，溫德給我翻譯：“等你回美國以後，所有人都會知道溫德的貢獻。”

王阿姨開始收拾屋子，我想把桌子往旁邊挪一下，好讓自己坐得離溫德近一點。但她把我趕到一邊，自己幫我搬椅子，她又端來了兩杯水，不過我和溫德都不想喝，她也就沒堅持。

離開之前，我問了溫德最後一個問題。在我們聊天時，他多年前種下的竹叢一直在窗外風中搖曳，在這個清朗夏日裡閃著金光。“在美國，種得了竹子嗎？”溫德很好奇。“竹子必須要有適合它的水土氣候。這幾株是我自己試著栽種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移植到美國。”“該怎麼移栽？”“你取下一株竹筍。但種下之後，它不會長出來。竹筍在地底下都有側株，所以取竹筍的時候要把它周圍的土都盡量一起移栽，否則養不活。”僅有這一次，溫德的思路井井有條。

“還能再見到你嗎？”我猶豫了。我還會在中國待三天，但是就讓一切終止於此吧，否則很難畫上句號。離開溫德家，走向我的自行車，王阿姨跑過來幫我裝包，還給我遞來一個袋子，裡面裝滿了梨罐頭和巧克力華夫餅。梁師傅也過來，一定要幫我推車，最後我向他道別，在灑滿陽光的路上飛馳，經過了荷花池，民主樓，一路直到外國人宿舍所在地——勺園。

* * *

兩年以後，北大邀請我參加 1987 年 12 月 19 日為溫德舉行的百年壽誕。當時，我所在的大學已經以溫德的名義開設了一個獎學金項目，以資助中國學生，並正籌備亞洲研究學位培養計劃。在北大一年時光裡，我愛上了未名湖，愛上了那裡飽經摧殘的老教授以及天才的學生們，以及勺園附近的磚牆，多少次，我牽著女兒安娜的手徜徉於合歡樹下。

溫德一向希望自己活到 100 歲，現在，雖然已經在捱日子，他終於勝利了。但是生日會卻像一場噩夢。我到他家的時候，裡面擠滿了學校和教育部的要人，還有包括美國之音（VOA）在內的中美各路媒體記者，美國使館的工作人員 Dewey Pentergrass 向溫德當面讀了美國大使的賀信。

但接下來的儀式純是為賓客而設，與溫德關係不大。他就像一個被喚

來履行自己角色的鬼魂，他有點心不甘情不願，甚至有點迷糊。眼前這些冠冕堂皇的走過場儀式很明顯與他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只能震驚於如此多的人，如此驚擾自己注意力，如此晃眼的閃光燈。最後在外屋，我吹熄了蠟燭，在碩大的兩層蛋糕上切下了儀式性的一刀。壽誕後，我又去看望過幾次溫德。溫德比 1985 年我第一次見時更加虛弱糊塗，但他還是很希望有人陪伴，也能滿帶感情地予以回應。如今，得到那麼多讚揚和敬意，他似乎對此頗為受用。很多信件，包括與龐德和聞一多的信件，在“文革”期間都被燒掉了。留下的那些信件，還有日記都轉交給我，等待我完成一部溫德傳，講述他與中西方最出色的多位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與貢獻，雖然材料有限，我們只能對此管窺蠡測。

我等不到參加溫德追悼會就必須回國，於是寫了一首詩，給北大英語系助理主任，希望它伴隨溫德的肉身一起焚化。有兩百人參加了在八寶山舉行的追悼會，學校還鄭重討論在溫德故宅前立一塊石碑。有一塊石碑在四季輪轉中，靜靜地矗立在溫德曾經愛過的荷花池邊上。——每念及於此，我心裡充滿了喜悅。

譯後記

為了支撐我的荒墟，我撿起這些碎片。

——T. S. 艾略特

1923年8月21日，36歲的溫德離開美國，從舊金山登上“東京丸”輪，11天後抵達南京。從此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裡，溫德先生以英國文學教授之身份，輾轉於東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與聞一多、吳宓、瑞恰慈、燕卜蓀、費正清等一批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師共事多年。曹禺、李健吾、錢鍾書、趙蘿蕤、盛澄華、李賦寧、王佐良、何兆武、季羨林、楊絳等下一輩學人皆曾受教於溫德。最為難得的是，溫德先生和中國人一起捱過了抗戰、內戰、“文革”等艱難歲月，他選擇了中國式的命運。

為溫德先生寫一部傳記，把他的一生故事講給世人聽，是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教授三十年前與即將辭世的溫德先生的一個約定。從此以後，幾乎不懂中文的斯特恩教授努力通過英文世界裡的中國研究著作了解中國歷史，並詳覽溫德先生的日記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相關檔案，用近半生完成這個約定。

譯稿先由余婉卉博士譯出一部分（第1—3章），餘下部分由我來完成。出於種種不可抗力，中文版延宕許久。斯特恩教授年過八旬，在他與我來往電郵的字裡行間，我能體會到那種深深的時不我待感，也因此當本書終於可以付梓時，我滿心歡喜，為斯特恩教授歡喜，更

為溫德先生歡喜。感謝岳秀坤副教授的推薦，也感謝張雅秋博士為這本書的全心付出。今年 12 月 31 日是溫德先生 128 歲誕辰，謹以此書作為給在天上的溫德先生的一份生日禮物。

馬小悟

2015 年 12 月 16 日

溫德年表

- 1887 生於印第安納州克勞福茲維爾
- 1905 (18 歲) 高中畢業，進入當地的沃巴什學院
- 1908 (21 歲) 遇到改變自己一生命運的恩師——詩人埃茲拉·龐德
- 1910 (23 歲) 獲沃巴什學院碩士學位
- 1911 (24 歲) 進入那不勒斯大學學習，在巴黎等地遊學
- 1914 (27 歲) 任教於印第安納州豪威軍事學院羅曼語系
- 1916 (29 歲) 任教於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高中
- 1920 (33 歲) 擔任芝加哥大學羅曼語系助理教授
- 1922 (35 歲) 結識正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留學的聞一多
- 1923 (36 歲) 從舊金山登上“東京丸”輪，赴東南大學任教
- 1925 (38 歲) 跟隨吳宓，轉到清華外文系任教
- 1927 (40 歲) 瑞恰慈夫婦新婚旅行來到北平，與溫德結識，共同開展基本英語運動
- 1937 (50 歲) 北平淪陷，留守清華，英勇護校
- 1938 (51 歲) 護送蒙古活佛抵重慶，見到蔣介石
- 1940 (53 歲) 經由滇緬公路來到昆明，負責中國正字學會
- 1943 (56 歲) 回美國，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顧問
- 1945 (58 歲) 以洛克菲勒基金會文化特使身份回西南聯大任教
- 1946 (59 歲) 夏季在大理麗江遊歷後，回到北平
- 1948 (61 歲) 保管聞一多骨灰
- 1952 (65 歲) 中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清華大學轉入北大西語系
- 1968 (81 歲) 紅衛兵來抄家，接受隔離審查
- 1982 (95 歲) 摧斷坐骨，從此臥床不起
- 1987 年 1 月 14 日，以百歲高齡辭世